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知識份子的香港路 開拓通識

社會科學通識叢書

主編：馬傑偉、吳俊雄

陳智傑 編著



知識份子的香港路
開拓通識

陳智傑編著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0

主編：馬傑偉、吳俊雄
社會科學通識叢書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八十二號

開拓通識：知識份子的香港路
Opening the Way for General Educ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Intellectuals

作 者：陳智傑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 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 刷：卓利製作公司

版 次：二零一零年四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441-582-7

© 香港中文大學 201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知識份子的香港路
開拓通識

今天的社會，結構複雜多變，文化風貌混雜全球與本土因素。理解和分析自己處身的立足點，尋找工作與生活的方向，是迫切又貼身的問題。教育界近年提倡通識教育就是希望回應時代的需要，讓學生及一般公眾，掌握日常資訊、瞭解社會脈搏、思索文化淵源。重視通識有助我們在變化多端的生活環境中，觸類旁通，因時制宜，成為通達的公民。

通識教育涵蓋的範圍極廣，包括天文地理、自然科學、文史哲及社會科學，尤以貼近現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層面的知識較符合課程旨趣。在香港的教育環境中，文科及理科較為公眾所理解，一般學生都熟知數理化、文史哲等學科的性質及其大概內容。然而，對於社會科學這個與通識關係密切的範疇，在學生與一般公眾心目中的印象卻比較模糊，對當中的科際分野亦未必能清楚掌握。一般印象也許以為心理學等於心靈雞湯、社會工作就是排難解紛、傳播學只是拍電影和報道新聞、地理不出考察濕地泥灘、政治學近乎議事論事、社會學則似是集成大成的萬用學科。

除了對各社會學科的內容印象模糊之外，更需正視的問題是，公眾對社會科學知識的性質，存有不少誤解，或視之為自然科學的恆常規律、或貶之為任意表述的個人觀點。在這篇序言中，我希望以自身的經歷，釐清大家對社會科學的一些誤解。

社會科學 vs. 自然科學

我的學術旅程，是在成長期間跌跌撞撞地輾轉走過自然科學、哲學、神學和傳播學，最後終覓得社會科學為職志的過程。

我在中學念理科，考進香港中文大學的生物系。那時的我喜歡造標本，把各種蝴蝶歸納分類，整整齐齊，井然有序。自然科學的長處，是掌握物理世界的規律，歸納出普遍適用的法則，然後按此預測研究對象的變化，知道在特定條件下， x 變項加 y 變項會產生 z 後果。

但在修讀生物學的時候，卻漸漸發現自然科學未能解答我的困惑。那時，表面上年青人有很多發展機會，但同時殖民地制度也衍生了很多社會問題，自然科學能透過理性瞭解物理世界的秩序，卻無法把個人與社會種種複雜難解的矛盾與衝突歸納成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公式。這正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之處。

社會科學以有思想文化的人類和他們聚居的社會為研究對象。與其他動物或許相異，人類文明是由文化累積而成，因著時地習慣的差異，多變而各具社會脈絡的特殊性。早期的社會學家也曾希望社會學知識能借用自然科學的模式，發展出客觀準確、通用於不同社會的規律，但經過多年嘗試和積累不少失敗的教訓後，大家漸漸發覺此路不通。社會科學要研討的問題內容實在複雜——文化因素比重較少的問題，例如基於生理原則的心理反應、慣常的社交距離、經濟學的簡單供求原理，或許還有普遍的通則可尋；可是其他社會文化課題，例如失序與自殺、社會的輿論議程、性與暴力的成因、選舉投票的策略分析等，雖隱然有迹可尋，然而成因複雜，實在不能如科學實驗般，可清楚控制因素的加入或減少，從而確定彼此間如何相互影響。

自然科學能反覆驗證，測試出準確的研究成果，但社會科學只能盡力精益求精，根據現有的資料進行分析，盡量達致概括性的結論。不過，每當新的發展出現，或有新的因素加入，或轉一個時空、換一種社會和文化，當中的人與事，各種因素的互動模

式，均會相應有所變化。換言之，社會科學對文化社會特殊性的敏感，與在不同社會中也普遍通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大大不同。

社會科學 vs. 人文學科

修讀生物系期間，為解答人生的意義，我選讀了哲學概論和神學思想史，興趣轉向研究典籍（如聖經），詮釋它們在今天的意義。我的心願是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可以知識影響別人。如盲頭蒼蠅亂飛亂碰中，突然發現：神學不就可以同時滿足兩者嗎？於是，那年我下了人生中一個很重要的決定：離開中文大學，轉到神學院修讀神學。

神學屬於人文學科範疇。人文學科關心文化、宗教、哲學、文學、歷史，宏觀地著眼於由人類社會歷代思辨與文化創造而累積下來的價值與思想，並關心這些文化遺產在當下所產生的意義。

人文知識講求詮釋，與社會科學有很多相通之處，譬如兩者均討論詩詞歌賦、歷史傳統、建築風格等人文議題，但著眼點卻有所不同。人文學科關心文本、文物、經典著述；社會科學則關心這些文化詮釋如何具體地在日常生活、集體禮儀、社會制度中發生作用。人文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雖不能截然區分，但大體而言，重點有別。前者較集中於文學、文本，而後者則會把意義的解釋置於實證的社會處境中討論，所以社會科學傾向採用問卷調查、訪問、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

簡單而言，兩種知識體系都會考察某一社群、某一組織、某一族群對社會生活各個範疇（例如性、性別、婚姻、集體認同、社會分層等）所投射的價值、意義與實踐，不過，社會科學較側重以實證數據作詮釋的基礎。

取得神學學位後，我卻沒有成為牧師。本來我就只是為了解答個人的疑惑而進入神學院，修讀後更肯定神學的形而上性質。自己確信的愈來愈少、懷疑的愈來愈多，覺得未能單憑對經典詮釋的再詮釋，說服自己堅定地傳道，並同時說服別人相信我的信

仰。神學畢業卻不做傳道工作，教會群體給了我不少壓力，我更因此感到在社會與個人之間，價值與信念往往產生極為複雜多變的作用。

就意義詮釋與社會現實的關係，在眾多觀點之中，社會科學的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較能令我在理解、解讀意義的同時，也關心和介入社會。實證主義（positivism）強調社會現實的客觀存在，並有規律運作其中。研究者可以記錄、分析這個實證世界，從中發現其運作規律，並將之化為社會科學知識。

後實證主義的分別在於：既肯定社會現實的客觀存在，但與此同時，也引入另一個理念，就是肯定身處社會現實的個人與群體，均會主動活躍地詮釋，賦予生活各層面不同而多變的文化意義。因此，社會客觀現實並非恆常固定，研究者只能盡量貼近正在變動中的現實，而無法像自然科學研究者那樣全面掌握研究對象並把「真實」收入理論之中。後實證（post-positivist）的分析進路，姑且簡化如下：既努力收集及分析實證數據，亦關心當中意義詮釋的多元變化。

社會科學與社會改革

當年在神學院的天台靜思，我知道自己最終的心願是希望與別人分享知識、參與社會。在神學院畢業後，因為喜歡創作，我再到美國修讀電影。回來後先後加入突破、無線電視、亞洲電視和香港電台從事幕後工作。那時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手執導演筒或當編劇，製作與社會實況有關的節目，關懷社會、亦介入社會。在香港電台的時候，快三十歲的我兼讀中文大學的傳播學碩士，那時才真正決定將來要在學術方面發展。也許社會科學最吸引我的，就是強調實證數據、文化特殊性，及學術分析的反思性（reflexivity）。

著名的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現代社會的發展軌迹，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馬克思的共產思想、經濟學家對市場運作的論述、社會機構的工具理性

管理，都左右著社會的建構與改造。社會科學不是「客觀」地發現普及定律，而是透過考察社會而生產知識；知識成熟後普及於世，若有機會取得社會的局部共識或被權貴採納，便往往「干擾」社會現有的結構，進而修改、創造或促成新的社會現實。

換言之，社會科學的反思性不是簡單的思辨、反映、記錄，也不僅是抽象思考，而是觀察考究、蒐集數據、分析整理、生產知識；而在知識介入社會之後，社會的形勢有所改變，研究者所觀察探討的社會現實亦變得與以前不同，需要進一步補充、修正。新產生的社會知識，又在社會場景中產生新的作用。

宏觀來看，對性別、身份認同、貧窮、文化保育、全球化、輿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若真能指陳社會實際的處境，亦會改變這些理論所指向的現實。因此，社會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知識內容是一個不停修正、參照、對比、觀察的過程。必須申明：這不表示社會科學的案例轉眼即過時；過去的有效案例，可成為今天的參照和未來作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跨學科的社會分析

也許大家不會感到意外，以我背景的混雜，在英國修讀傳播學博士的時候，對學科的分工其實有一種反叛心理。幸好那時的老師，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者柯倫（James Curran）和文化研究學者莫利（David Morley）給我的自由度很大，亦影響了我跨學科的研究傾向。

近年社會科學跨學科的趨勢漸漸明顯。上世紀曾有一段頗長時間，社會科學專注於發展專業化與專門化的科際界線。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傳播學等學科，積極建立專業團體，在大學中鞏固各自的學術地盤。然而，近年社會流動性愈來愈大，各領域互相結連，漸難以單一學科的角度深入把握社會議題。譬如貧窮、身份認同、文化保育等問題中就有社會學、社會工作、經濟學、傳播學、心理學、人文學、人類學等元素，很難歸入單一的學科來處理。

回港後開展研究時，我雖在傳播學院任職，但也體會到如果僅只分析媒體，或嫌過份單薄，無法處理社會的複雜問題。所以在理論上，我對社會學家紀登斯和鮑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最感興趣，在學科上亦深受城市地理學和社會理論的影響。近十年則傾向以民族誌（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走入社會現場，近距離觀察，盡量貼近社會現實。

跨學科的要求，其實也是近年倡議通識教育的其中一個原因。不過，跨學科的思考方法並不容易，因為各專業已發展出各自豐富的文獻與理論傳統，跟隨個別專業的進路去分析問題較為輕鬆安穩；而跨學科意味思考者必須涉獵各種不同的理論，並很容易陷入斷章取義的錯誤中。我便不時走出傳播學，在別人的「地盤」尋找概念，常有外行人的不安感。

對於跨學科常遇到的「外行人」問題，很難有周全的解決方法。我的建議是，以研究課題為本，集中於一個有研究價值的課題，搞清楚背後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這牽涉如何問、問甚麼、為何問的環節。然後不避學科門派，在相關學科中追尋現有案例，借用相關概念進行分析。這是我個人的經驗之談，也是通識研究的其中一個特性。這個系列的編輯方針，亦著眼於社會科學強調處境、詮釋、實證、反思，以及跨學科等特性，盡量展現通識思考的門路。

我在一九七七年考進香港大學的社會科學院，第一個印象是學科紛陳，當中有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工作、社會學和統計學。我在中學時讀過類似經濟學的EPA（經濟及公共事務），雖然成績好，但不喜歡，所以在大學時沒有選修。選修過心理學和政治學，覺得前者太傾向於討論個人，而那時候教政治學的教授殖民地氣息過重，因此我主要修讀了社會學和社會工作。

進大學前，我已開始做義工。入大學後最掛心的始終是校園外的社會。那時很少正經讀書，我當了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總編，一天到晚窩在編輯部，今天回看，當年唯一做的，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本地化。有一段時期，我曾經以為社會科學應該像自然科學一般，事事井井有條；但因為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所以很早就認清楚社會脈絡和歷史背景的重要。自那時開始，便喜歡看歷史，也愛看平民生活的研究，而這正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之處。

一九八零年，我成為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當時中國剛開始經濟改革，於是打算進內地做實地研究。往後過程誤打誤撞，本來打算研究工人民主，做關於工人階級的質性研究，想走入工廠訪問工人，但大陸才剛開放，要找工人作深入訪問並不容易，於是論文變為研究《人民日報》的文本分析。

我在八二年到英國讀博士，依然關心工人

吳俊雄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階級，但轉為研究在戴卓爾（Margaret H. Thatcher）統治下工人階級的集體認同和團隊文化。我的研究方法是民族誌（ethnography），研究過程著重與人面對面溝通交流。那時想透過工人領袖（shop steward）找普通工人，最後卻發覺前者比較容易接觸，而且因為他們身為領袖，常常要講話，思想已經整理過，訪問起來容易直達要旨。後來讀多了書，更確認他們對英國社會的走勢舉足輕重。於是，整個研究重心從工人轉向工人領袖。訪問時，對方常常說個不停，不時夾雜地區方言。我邊訪問邊錄音，然後回家反覆細聽，努力加上想像，總算能夠明白七、八成。

民族誌著重詮釋，但其實從訪問到分析是一個交費學習的過程。做訪問要做得好，需要經驗，知道甚麼時候問，甚麼時候停；詮釋理解的過程，也要有人生閱歷才可以分析到位。回看我那時的論文，真的做得很粗疏。現在我的研究理論較少，但做得比較厚。我喜歡的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一直強調，民族誌重點在於厚度（thickness）。厚度指的是對細節的觀察和描寫，優勢是理論較少，人的故事先行，在講故事的過程會慢慢見到人生的轉折和複雜，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如果以理論先行，太想以故事來引證理論，有時看了最初的十頁已經知道結局如何。

做不同的研究要用不同的方法。數人頭有數人頭的方法，研究人心有研究人心的方法。問卷調查之類的大規模分析能夠找到社會的大致取向，民族誌這類仔細的詮釋，可以細膩地探討人到底在想甚麼。兩者成敗的關鍵同樣在於嚴謹的態度和對細節的著重。

在英國做了三年研究後，回到香港在理工學院一面教社會學一面趕論文，最後花了三年時間才在一九八八年完成。從前讀書的時候以馬克思主義傳統為主，但教書的時候，常常提醒自己，不可以一言獨大，要多元，要尊重你的對手。再加上當時理工學院的學生背景各異，有些強調理論，有些著重實踐，所以要用心

將學術世界的各種聲音梳理出一個細緻的說法，即使這些聲音本來未必表達得如此清晰。

在求學期間，我多留心源自馬克思和韋伯（Max Weber）的學術傳統，但教書時開始重讀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柏森士（Talcott Parsons）那類傾向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社會學派著作，才發覺原文並非我在讀書時所想像的那麼不濟。來自馬克思傳統的社會學擅長探討社會不平等，研究階級、性別、全球化，對分析權力很有幫助，但在面對感情、美藝和道德的時候就難以應對。譬如討論音樂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所謂古典音樂的「品味」（taste）是階級分界策略的產物，但他對音樂本身和人類感情的互動，卻未有觸及。美國根源於象徵互動主義（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文化社會學者，如貝克（Howard Becker）的著作《藝術的世界》（*Art Worlds*），就能夠對這方面加以補足。

我的跨學科傾向，開始於馬克思主義對大結構的分析，接上後來社會科學界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強調結構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再結合對生活的關注。於是，我既留意宏大的全球化現象，也對微觀的民間習慣感興趣；在方法上，我則堅持要有厚度。我也堅持做社會分析要有人文主義的態度，站在弱勢者的一邊，揭示人文關係，批判權力集中和資本主義的惡習。

除多元開放和兼容並蓄之外，我也強調要瞭解香港的實況和本土特性。香港發展的經驗是一套獨特的港式資本主義，它由以下三種元素結合：（一）沒有經歷過福特主義（Fordism）年代的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在美國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仍然強調大規模生產、大型官僚架構的時候，香港已重視靈活有彈性的生產模式。（二）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殖民性——政治上壓抑，文化範疇卻傾向開放。（三）中國傳統的影響——二次大戰後南來的兩類內地移民各有風格，一類是來自上海的海派，見過世面；另一類是位處邊陲的嶺南文化，獨立、傾向實際、不重大義。這些元素結合起來，形構了香港的特殊處境。

本系列的書，探討媒介與身份認同、普及文化、文化保育、

性與性別、貧窮等大問題。我們的編輯方針是著重本土性，有歷史視野，從具備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之上展開討論。本系列在分析這些通識主題的時候，我們希望展示社會科學的特性，讓讀者不單認知各種相關內容，亦掌握一套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回歸前夕，大家紛紛思考到底香港是甚麼，香港人又是甚麼，當時對身份認同的困惑、對香港前途的思考，也是引發今天重視通識的開始。

開拓通識

知識份子的香港路

陳智傑編著

目錄

總序一	社會科學與通識教育 馬傑偉	vii
總序二	我的本土方法：社會分析的兼容與厚度 吳俊雄 ...	xiii
序	公共知識份子的香港路 陳智傑	1
第一章	鍾庭耀 民調的保育工作	21
第二章	陳韜文 民意解讀的雙刃劍	31
第三章	張炳良 位置之戰的火車頭	41
第四章	司徒薇 讓民主落戶民間	51
第五章	梁文道 以香港為家的大中華知識份子	63
第六章	梁啟智 嚴謹地求真、謙卑地修正	77
第七章	邵家臻 戲假情真的身體政治	89
第八章	鄧小樺 生活方式：抗爭意識的泉源	99
第九章	朱凱迪 民間記者：讓公民動起來的身份	111
第十章	陳健民 中國公民社會的農夫	121
通識系列編後語	馬傑偉 吳俊雄	129
索引		131

前言

著名公共知識份子龍應台（2008）曾說：「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若以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來理解這比喻，公共知識份子可算是「文化工程師」——詮釋、創造活躍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知識以至核心價值，並以公共論述凝聚人們的集體經驗。

集體經驗、社會知識、公共論述，以至公共知識份子本身，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烙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火紅的民主運動和社運、六四屠城的血色震撼、九十年代回歸迫近的「大限」感覺、由香港伸延至大陸的跨境生活經驗、日益抬頭的問責意識、回歸後對香港本土經驗的著重、尋根和重塑，都緊扣著社會知識的發展，及公共知識份子的思潮。

時代塑造人，人亦不斷重塑時代，知識的發展是時代與人互動交織的產物。筆者與馬傑偉和梁款於二零零八年夏秋之交，走訪了十位活躍於香港評論界、學術界、文化界和社運界的朋友，我們無意把這系列的訪談視為香港故事的全部，但相信他們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均與幾十年來香港的時代轉變息息相關：

- 張炳良於八十年代提出的中產大辯論、鍾庭耀自九十年代以來的香港民意實錄、陳

韜文及陳健民把關心的範圍由香港延伸至中國，見證香港民主論述發展與中國國情交織；

- 司徒薇進入社區、梁文道遊走於華人媒體圈、邵家臻「玩微軟」（微觀及軟性的寫作手法），可說是香港本土論述的進一步發酵和實踐——把民主和人文精神實踐於社會基層、實踐於大中華的公共論述，以至社會工作和文字創作；
- 梁啟智對論述概念的批判反思、鄧小樺以個人生活方式區別於主流、朱凱迪以民間記者的身份介入社會運動，重塑「發展」涵義，則是本土論述「位置之戰」（war of position）的重要元素：不斷修正概念上的模糊之處，並以多個面向——公共論述、政策倡議、社會運動、抗爭手法、文學表達，以至日常生活方式，實踐香港本土精神。

這些訪談的目的是把「公共知識份子」一詞放置於公眾討論的議程，由探討一眾「文化工程師」的思想言行開始，思考香港公共論述的演化及與知識份子之間的互動。

進一步而言，公共論述乃通識教育的重要元素。通識不在於「通通都識」，事實上，學海無涯，個人力量有限，「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唯有來自五湖四海、處於社會不同位置的學派和專家，都盡量參與公共論述的討論，並以雅俗共賞的文字公開所學所得，讓大眾同享知識，更讓不同流派的觀點對話辯論，去蕪存菁，促成社會進步。從這角度來看，公共論述乃通識教育取材的主要來源；而公共論述內不同流派的觀點和對話，則為刺激莘莘學子代入不同社會角色，嘗試演練批判思考及理性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和「練功對手」。

是故公共知識份子乃是開拓社會通識的要員：介入民主化（張炳良、陳韜文）、活保育（梁啟智、朱凱迪）等議題的社會討論以至行動；整合學術與社會運動（司徒薇）、民意調查與社會發展（鍾庭耀）、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與文字創作（邵